

DOI:10.19322/j.cnki.issn.1006-4710.2020.04.003

后疫情时代环境规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杨冬民¹, 明丽丽¹, 杨博捷²

(1. 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2. 西安理工大学 图书馆,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后疫情时代,陕西省对环境规制的坚持是否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2006—2017年陕西省10市动态面板数据,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产业优化指数,运用面板模型就环境规制对陕西省10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环境规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城镇化水平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也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阻碍作用。据此,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时期,陕西省仍需坚持环境规制,推进产业结构实现更好的优化。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环境规制; 产业结构优化; 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10(2020)04-0456-05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haanxi's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YANG Dongmin¹, MING Lili¹, YANG Bojie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2. Library,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s Shaanxi's persistenc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f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dynamic panel data from 10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7,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intensity index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an index for industry optimization, and used a panel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10 c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result of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haanxi'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a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Shaanxi'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at the scale of the industry hinders the optimization of Shaanxi'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Shaanxi Province still needs to persist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better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post-epidemic er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panel data model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与疫情防控逐渐成为各省市中心工作,特别是在中国8个省份公布基建投资总计34万亿元背景下,环境规制是否会为其中高排放投资让路?这是一个有待探究的课题。面对这个问题,陕西省政府未选择为高排放投资让路,未选择为加快推进全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未选择为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与此相反,陕西省政府于2020年6月出台了《陕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和《陕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办法(试行)》,并于9月在陕西环境权交易所举办了陕西首场排污权二级市场(即企业间

收稿日期: 2020-10-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1-18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1.1294.N.20201118.1003.004.html>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D31); 陕西省科技厅重点项目(2019KRZ011)

第一作者: 杨冬民,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E-mail:1635146986@qq.com

交易)。而据陕西环境公报和陕西统计年鉴数据,近年来陕西省实现经济增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加大环境规制:2017年陕西省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是30 632.79万t、21.66t和9.93t,均低于2006年环比数据;陕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陕西省GDP总值21 898.81亿元,比2006年(4 743亿元)增长了462%,全省人均GDP为57 266元,比2006年增长了487%。这表明,陕西省环境规制实施期间,经济增速未受到较强负面影响。那么,陕西省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本文对此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环境规制问题研究较早,其重点主要是比较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影响。学者们对环境规制提出两种分类:一是基于干预主体不同,二是基于干预方式不同。国内学者提出了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方法,如利用废水排放达标率、烟尘去除率、粉尘去除率、SO₂去除率以及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指标,构建综合评价环境规制强度指标体系^[1]。

目前,较多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直接促进效应,还可以通过产业进入壁垒、国际贸易及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间协同发展间接产生驱动作用^[2]。此外,学者研究得出环境规制工具类型会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正向效应受制于科技创新水平;同时,适宜强度且得到有效实施的环境规制利于引导区域资源配置,培育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3]。通过金融调节作用实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有正向促进作用^[4]。此外,实行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应合作进行环境规制的制定及实施,推进地区间产业协同发展,弱化环境规制空间抑制效应^[5]。还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有效的倒逼效应。原毅军、谢荣辉利用1999—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倒逼机制和门槛特征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已成为调整产业结构新动力,其影响是先抑后扬再抑^[6]。

目前,国内外已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缺乏对陕西省相关问题研究。本文拟选择陕西省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及商洛等10个城市,运用2006—2017年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指

标,就陕西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陕西省环境规制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影响,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解释变量是环境规制指标,影响陕西省10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研究模型中。构建具体模型如下:

$$R_{it} = \alpha_0 + \alpha_1 eri_{it} + \alpha_2 urb_{it} + \alpha_3 gov_{it} + \alpha_4 dev_{it} + \alpha_5 scal_{it} + \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R_{it} 表示 i 城市在 t 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数,是被解释变量; eri_{it} 表示环境规制,是解释变量; urb_{it} 、 gov_{it} 、 dev_{it} 、 $scal_{it}$ 为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 urb_{it} 为城镇化水平, gov_{it} 为财政支出, dev_{it} 为经济发展水平, $scal_{it}$ 为产业规模; α_i , $i=0, \dots, 5$ 为相应系数; ϵ_{it} 为随机误差。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优化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是地区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依据Clark定律通过非农产业占比提高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Moore结构变动指数、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等指标来衡量。本文借鉴徐德云构造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7],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由第一产业占主导逐渐转向第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重要特征,分别对三大产业依次赋予1,2,3权重。这种计算方法与理论相符合,具体公式为:

$$R_{it} = \sum_{m=1}^3 y_{i,m,t} \times m \quad (2)$$

式中: $y_{i,m,t}$ 代表第 m 产业在 i 地区 t 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R_{it} 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其取值在1~3之间; R_{it} 在1附近取值或等于1,说明经济结构以农业结构为主; R_{it} 在2附近取值或等于2,说明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占主导,工业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_{it} 在3附近取值或等于3,说明第三产业占比大,服务业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8]。

2.2.2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是一个较为复杂且困难的问题,本文借鉴原毅军(2014)所构建的环节规制强度综合测量体系^[9]。该指标构建方法为首先对选取的3个单项指标进行线性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

和数量级差异,即通过数学变换将各指标的取值换算为 $[0,1]$ 的取值范围内。计算公式为:

$$PR_{ij}^s = [PR_{ij} - \min_j(PR_{ij})] / [\max_j(PR_{ij}) - \min_j(PR_{ij})] \quad (3)$$

式中: i 为城市编号, $i=1,2,3,\dots,10$; j 为各类污染物编号, $j=1,2,3$; PR_{ij} 为各单项指标原始值; PR_{ij}^s 为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其次,计算本文3个单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W_{ij} 。对于不同城市而言,“三废”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对于某一城市,其不同污染物的排放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对各城市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指标赋予不同权重,用以反映各市主要污染物的治理力度变化。权重系数计算如下:

$$W_{ij} = (\sum_i E_{ij}) / (\sum_i Y_i) \quad (4)$$

式中: W_{ij} 为城市 i 中污染物 j 的调整系数; E_{ij} 为省份 i 污染物 j 的排放量; $\sum_i E_{ij}$ 为全省 j 类污染物排放总量; Y_i 为城市 i 工业增加值; $\sum_i Y_i$ 为全省工业增加值。计算出每年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调整系数后,再计算 2006—2017 年间调整系数的平均值 \bar{W}_{ij} 。

最后,将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重进行计算,得出各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 ER_i , 见式(5)。其中, ER_i 数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环境规制程度越强。

$$ER_i = \frac{1}{4} \sum_{j=1}^3 \bar{W}_{ij} \cdot PR_{ij}^s \quad (5)$$

2.2.3 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进程的因素较多,除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面板模型还需加入一些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了几个较有代表性的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 urb ,用地区城镇人口数量与地区总人口比值表示。城镇化可以提高地区服务业和工业在产出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城镇化所带来的生产要素集聚和基础设施改善促使企业间竞争创新,推进地区技术进步,这一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的另一种形式^[10]。因此,将城镇化水平作为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财政支出 gov ,政府当年财政支出与 GDP 比值。政府在产业中投入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引导性,会吸引相关企业投资,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部分研究中,财政支出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是正向的^[7],故将其引入模型中。

经济发展水平 dev ,用地区当年 GDP 增值与当

年 GDP 比值表示。在经济发展中,地区劳动力首先从低劳动生产率和低人均收入的农业逐渐转移到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制造业,然后再转移至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产业规模 $scal$,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与地区 GDP 比值表示。工业化水平提升是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动力^[8],也会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产业规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

2.3 描述性分析

本文实证采用的数据集是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城市统计年鉴。由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排放情况普查尚未完成,2018 年及以后数据还未公布,本实证采用的时间段为 2006—2017 年,包含陕西省 10 个城市。所有变量描述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 panel data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个数
r	2.21	0.11	2.05	2.58	120
eri	0.83	0.90	0.04	7.60	120
urb	42.97	12.49	15.20	67.12	120
gov	19.83	6.91	7.53	33.71	120
dev	12.46	3.60	1.30	25.30	120
$scal$	1 212.00	1 331.79	43.73	7 556.47	120

根据基础数据可知(见图 1),陕西省 10 市中,西安市自 2006 年起,其主导产业为第三产业;在 2010 年及以前,第三产业曾在汉中、榆林及安康三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 2011 年及以后经济发展主要由第二产业为支撑;从 2006 年至 2017 年,其他 6 个城市经济发展均是以第二产业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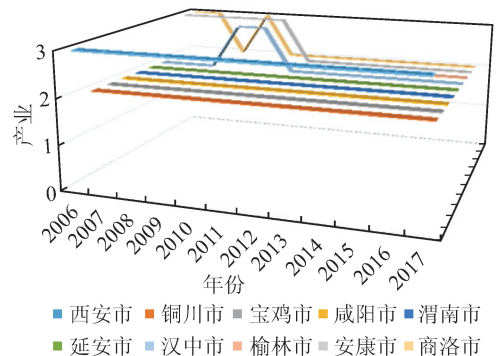


图 1 陕西省 10 市三大产业中主导产业变化情况(2006—2017)

Fig. 1 Changes in leading industries among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10 cities in Shaanxi(2006—2017)

根据式(1),计算得出陕西省 10 市 2006—2017 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数(见图 2)。整体上,陕西 10 市产业优化指标呈现日益提高态势,表明陕西省整体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中。从各个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指标数值来看,西安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远高于其他 9 个城市,这主要源于其他城市以第二产业为主,而西安市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且市政府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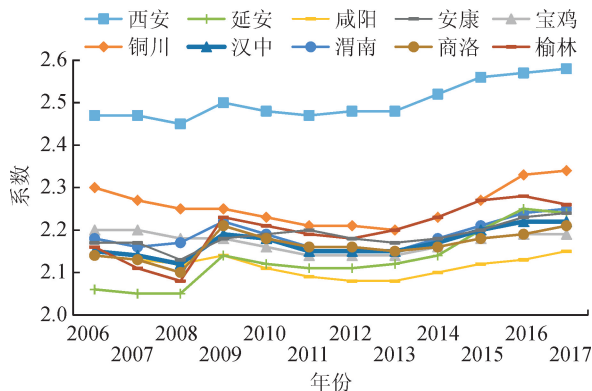


图 2 陕西省 10 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系数图(2006—2017)

Fig. 2 Coefficients of advanced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10 cities in Shaanxi(2006—2017)

根据式(3)~(5)计算陕西省 10 市环境规制指数(见图 3)。总体上,陕西省 10 市环境规制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这说明环境规制对象的基数正在减小,陕西省近些年环境规制实施正逐步取得成效。10 市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在 2014 年达到了峰值,而后下降。从局部来看,可能和 2014 年陕西省启动“治污减霾·保卫蓝天”工程及《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有关;安康、咸阳及延安在一开始环境规制强度系数较高与其减排基数较大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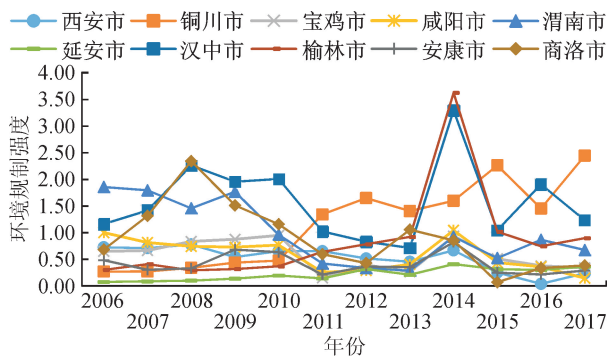


图 3 陕西省 10 市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图(2006—2017)

Fig. 3 Intensity coefficien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10 cities in Shaanxi(2006—2017)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Stata15 对数据进行回归。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究环境规制对陕西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环境规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回归结果
Tab.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变量	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结果
<i>eri</i>	0.015 7* [0.006 1]	<i>dev</i>	-0.651*** [0.089 9]
<i>urb</i>	0.143*** [0.024 3]	<i>scal</i>	-0.050 6** [0.011 3]
<i>gov</i>	0.013 1 [0.071 2]	<i>R</i> ²	0.665 0

注:方括号中为标准差;*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由表 2 可见,估计模型调整的判决系数为 0.665 0,这说明估计模型拟合度优良,能够解释 66%的选取数据变化态势。由表 2 可知,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政府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规模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规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在 5%水平下显著性为正值,与预期相符,说明环境规制有促进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作用。在 5%显著性水平下,环境规制每提高 1%,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相应提高 0.015 7%。

两个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和政府支出与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正相关。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提高 0.143%,且城镇化对陕西省 10 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向推动作用通过了 0.1%显著性检验,表明陕西省各市城镇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出每增加 1%,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提高 0.013 1%,但政府支出没有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陕西省现有经济政策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了较小引导作用,但缺乏有效性。究其原因主要是陕西省当前政府支出指向性较弱,未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上提供持续且针对性较强的资金投入。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规模与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现显著负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种情况出现主要原因是,除西安市外,陕西省其它 9 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总体规模大,陕西 GDP 增速主要由第二产业支撑,致使其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较强的负相关。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环境规制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构建,以及运用这些指数进行相关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和政府支出水平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政府支出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规模对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负向作用,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较高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结合后疫情时代背景,给出以下建议。

1) 后疫情时代陕西仍应重视环境规制立法和执法

由于环境规制可以促进陕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疫情时代陕西应重视环境规制立法和执法,坚持实施环境规制,适当提高陕西环境规制标准,加大环境规制力度。过去半年里,新冠肺炎疫情对陕西各方面造成了较严重的冲击。坚持高质量发展、绿色复苏大方向仍需坚持,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并在这个时期积极补短项、强弱项,加强向清洁能源转型,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加强向清洁能源转型,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恢复生物多样性,这要求社会在生态环境领域迫切需要及时、有序、高效响应。现阶段,陕西省各市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排放、政策倾斜程度具有差异性,因此,政府在环境规制强度和手段选择上需考虑地区差异。

2) 政府有针对性积极推进综合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有利于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后疫情时代,陕西省各市更应积极推进当地综合城镇化进程。综合城镇化是地区人口、经济、地域景观、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城镇化^[8]。对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相对较高的地区,虽然人口城镇化空间有限,但综合城镇化前景广阔,能够较大程度上推进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在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效性有待提高前提下,需要陕西省各市政府增加对环保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和投入,鼓励科研机构开展全省范围内环保意识、环保组织等相关内容调研,以获取第一手真实数据,推进学术界对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科学研究,抓住这次技术范式转换带来的机遇;各机构应在技术突破和发展模式上做出合理调整,为后疫情时代陕西省经济恢复提供新视角。

3) 大力促进陕西省新兴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规模阻碍了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陕西省现阶段第二

产业占比基数大,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陕西省各城市应进行适宜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调整,注重对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支持,促进陕西省各市第三产业发展以吸引企业入驻,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扩大政府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规模,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带动社会资金投向处于创业早中期阶段的创新型企业。综合运用风险补偿等财政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完善鼓励创新、引导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支持政策,在继续做强高技术产业基础上,进一步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提升第三产业占比,实现陕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 [1] 傅京燕. 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2): 73-77.
FU Jingya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air pollution: Guangdong's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 19(2): 73-77.
- [2] 钱莎莎,高明,黄清煌. 环境规制实现了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J]. 生态经济, 2019, 35(1): 154-160.
QIAN Shasha, GAO Ming, HUANG Qinghuang. Whet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alizes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economy growth? [J]. Ecological Economy, 2019, 35(1): 154-160.
- [3] 孙早,屈文波. 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消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9(3): 41-51.
SUN Zao, QU Wenbo.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ergy consumption [J]. Modern Finance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9, 39(3): 41-51.
- [4] 杨博,王林辉,赵景. 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转向“结构性减速”源于产业结构吗? ——基于一个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5): 65-79.
- [5] 李虹,邹庆.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J]. 经济研究, 2018, 53(11): 182-198.

- Wuh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3.
- [14] 庞莹莹. 湖泊流域纳污能力及污染负荷分配研究[D]. 郑州:郑州大学,2010.
PANG Yingying. Research on permissible pollution bearing capacity and wasteload allocation in lakes basin [D]. Zhengzhou: Zhengzhou University, 2010.
- [15] 吴悦颖,李云生,刘伟江. 基于公平性的水污染物总量分配评估方法研究[J]. 环境科学研究,2006,19(2): 66-70.
WU Yueying, LI Yunsheng, LIU Weijiang. Study on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of total pollutant load allocation for water bodies[J].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06, 19(2): 66-70.
- [16] 毛光君. 河流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法研究——以大辽河控制单元为例[D].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2013.
MAO Guangjun. Study on watershed waste load allocation: take Daliao River control unit as an example [D]. Beijing: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3.
- [17] 张宏斌,赵洁,訾香梅. 渭河干流纳污能力与限制排污总量计算分析[J]. 陕西水利,2010(1):35-38.
(责任编辑 卢秀,周 蓓)

(上接第 460 页)

- [6] 周柯,王尹君.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J]. 工业技术经济,2019,38(2):137-144.
ZHOU Ke, WANG Yinju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J]. Industrial Technology & Economy, 2019, 38(2): 137-144.
- [7] 徐德云. 产业结构均衡的决定及其测度:理论解释及验证[J]. 产业经济研究,2011(3):56-63.
XU Deyun. The determin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ndustry structure equilibrium: study from a new perspective [J]. In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 2011 (3): 56-63.
- [8] 纪建悦,张懿,任文菡.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生产性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视角[J]. 中国管理科学,2019,27(8):57-65.
JI Jianyue, ZHANG Yi, REN Wenha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based on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perspective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9, 27(8): 57-65.
- [9] 原毅军,谢荣辉.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14(8):57-69.
YUAN Yijun, XIE Ronghui.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empirical tes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8): 57-69.
- [10] 靖学青. 城镇化、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长江经济带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49(3):119-128.
JING Xueqing.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11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20, 49(3): 119-128.
(责任编辑 王绪迪)